

孙中山 经济思想

胡显中 著

孙中山经济思想

胡显中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 魏允和 鱼建光
封面装帧 王申生

孙中山经济思想

胡显中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商务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5.25 字数 109,000

1985年9月第1版 1985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4,700

书号 4074·574 定价 0.78 元

目 录

第一章	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	(1)
第二章	土地问题	(11)
一	平均地权的提出及其理论根据	(13)
二	平均地权的具体办法	(27)
三	耕者有其田	(33)
第三章	资本问题	(38)
一	节制资本	(41)
二	发达国家资本	(52)
三	利用外资	(56)
第四章	实业问题	(61)
一	“兴实业为救贫之药剂”	(61)
二	《实业计划》剖析	(67)
第五章	教育问题	(77)
一	教育为立国之本,人才为当务之急	(78)
二	关于国民教育体系的设想	(84)
第六章	民生主义总论(一)	(89)
一	思想渊源	(89)
二	民生史观	(99)
第七章	民生主义总论(二)	(102)
一	旧民生主义的性质是涂饰了主观社会主义	

色彩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	(104)
二 新民生主义的性质就是新民主主义	(108)
三 新民生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异同	(115)
第八章 货币学说	(123)
一 货币的本质	(123)
二 货币的产生	(127)
三 纸币	(131)
第九章 人口思想	(142)
一 忧虑中国“人满之患”	(143)
二 解决中国人口问题的办法	(148)
三 “忧虑人口减少”辨析	(154)
结束语	(158)
后记	(161)

第一章 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

十九世纪中叶，英、法侵略者叩关的大炮声，惊醒了东方睡狮的酣梦。五千年的文明古国，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外有强邻四逼，虎视鹰瞵，蚕食鲸吞；内则老朽衰败的封建王朝，御侮无方，残民有术。当此国家民族危急存亡的紧要关头，爱国志士，纷纷奋起。被誉为晚清思想界一颗慧星、维新派中最富有献身精神的谭嗣同，面对着山河破碎、国土沦丧的危局，用深沉而愤慨的诗句，唱出了时代的悲歌：

四万万人民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

不爱红妆、偏爱武装，不恋温室、血溅刑场的鉴湖女杰秋瑾，用气壮山河的笔触，表达了革命志士救国救民、力挽狂澜的壮志雄心：

拼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

中国，走到了历史的岔路口。中国人民面临着生死存亡的重大抉择：

是束手沉沦，甘心做亡国奴？还是奋发图强，内扫积弊，外御强寇，挺身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在这份庄严的历史考卷面前，不同的阶级、不同的代表人物苦心孤诣地寻求答案。封建地主阶级顽固派主张：一切照旧，凡是大清陈规不可改，祖宗家法不可易。地主阶级开明派则主张：为了救亡图存，

应该“师夷长技以制夷”(魏源语)。新兴的、软弱的资产阶级却力主变法图强。改良派首领康有为说:“非变通旧法,无以为治。变之之法,富国为先。”中华帝国好似一个久病沉疴、体态臃肿的患者,招致了各色各样的社会庸医和江湖术士。他们无不自以为是起死回生的妙手,热心地开出了回春转阳的灵丹妙方。但是,他们的方案或者根本行不通,或者一经试验,便宣告破产。

就在这中华民族国难当头的严重时刻,在祖国黑沉沉的夜幕上空,从南方亚热带椰林深处,升起了一颗璀璨夺目的巨星——孙中山。

马克思说:“每一个社会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伟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它就要创造出这样的人物来。”^①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时代,孙中山便是这样的伟大人物。

历史早已判决了中国封建专制王朝的死刑,孙中山便是这一庄严判决的执行官。他所领导的辛亥革命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送进了坟墓。同时,孙中山又是中国近代政坛上的报幕员,他向全世界宣告:新兴的资产阶级在中国革命舞台上的正式演出,现在开始了。

孙中山原名孙文,字载之,号逸仙。后因从事革命活动流亡海外,曾用日本姓氏中山樵,后遂以“中山”为名。这就是孙中山名字的来历。

一八六六年十一月十二日(旧历十月初六日)孙中山诞生在广东省香山县翠亨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里。后人为了纪念这位伟人的历史功绩,将其原籍香山县改名为中山县。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50页。

根据孙中山的自述,“生而为贫困之农家子”,从六岁开始就从事农业劳动,因此“早知稼穡之艰难”。十三岁随母往夏威夷岛,投靠早年出洋谋生的哥哥孙眉。“始见轮舟之奇、沧海之阔,自是有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十八岁回国,辗转求学于香港等地。二十一岁改习西医,毕业后曾在广州、澳门等地悬壶济世。由于医术精湛、医德高尚,闻名遐迩。孙中山经常义务施诊、救治贫民。但是后来又觉悟到“医术救人,所济有限,……若欲救国救人,非锄去此恶劣政府必不可”。^①乃于行医同时,从事政治活动,结合同志、探索理论,以期最终推翻封建专制统治。

孙中山革命思想确立于何时,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据孙中山的自述,是始于一八八五年。“予自乙酉中法战败之年,始决倾覆清廷、创建民国之志”^②。但是,根据现有资料,此说似应存疑。一九〇〇年孙中山上书给他的同乡、退休的清朝外交官郑藻如,披陈心迹。信里写道:“某之翘首以期用世者非一日矣”。而最能说明孙中山当时思想状况的文章,则是《上李鸿章书》。他写道:“当今风气日开,四方毕集,正值国家励精图治之时,朝廷勤求政理之日,每欲以管见所知,指陈时事,上诸当道,以备刍蕘之采。”“推中堂育才爱士之心,揆国家时势当务之急,如文者亦当在陶冶而收用之列”。^③显然,这样的文字,实在“没有超出同时期康有为上皇帝书的水平”^④。

① 《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83、25、47页;《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59页。

② 《孙中山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68页。

③ 《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8、16页。

④ 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72页。又据孙中山本人的回忆,他确曾在1894年中日战后“草拟了一份请愿书,征集到数以百计的签名后,把它呈送到北京”(见《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48页)。这份请愿书至今尚未发现。

孙中山本人后来也公开承认上书目的是“冀万乘之尊或一垂听，政府之或可奋起。”如果说，一八八五年，孙中山二十岁的时候，就立下了革命之志，要倾覆清廷、创建民国，那么，上述行为和文字就难以理解了。所以，根据孙中山早期作品，可以看出，虽然孙中山满怀着爱国爱民的思想情愫，但这种爱国思想还没有得出革命的结论，而是抱有某种改良的幻想。再根据回忆资料，孙中山当年私人谈话中有所谓中央革命和地方革命之说，亦可为佐证。他认为：上书如果被采纳，“借此进身”，就可以自上而下地实行“中央革命”，则可收事半功倍之效。^①实事求是地说，当时孙中山思想的性质，还只是“改良祖国”的政治热情^②。

孙中山早年有过改良主义思想，并且这种思想一度支配他的某些活动，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看来，毫不足怪。马列主义经典作家教导我们：“一定时代的革命思想的存在是以革命阶级的存在为前提的”，不应该使思想“独立化”^③。既然孙中山青年时代处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正在形成的阶段，这个阶级还没有成为当时中国社会上一个独立的政治力量，因而不可能产生明确的革命要求，只能寄希望于封建王朝的变法维新，来实现本阶级的利益。这就是当时资产阶级改良派维新运动气势鼎盛的时代背景。孙中山毫无疑问也受到了这种思潮的影响。^④

① 冯自由：《中国革命运动二十六年组织史》，商务印书馆1948年版，第13页。

② 《辛亥革命史》上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77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3页。

④ 孙中山与当时的改良派著名人士何启、郑观应、王韬等过从甚密。这些人的共同思想基础是：“变法自上而下者，顺而易”。孙中山与他们在通信中讨论时局，政见“颇为吻合”（参见冯自由：《中国革命运动二十六年组织史》，商务印书馆1948年版，第14页）。

我们这样分析,丝毫没有贬低孙中山的革命精神,而是用历史的、发展的眼光来看待孙中山思想从萌芽、发展到成熟的全部历程,研究孙中山探求救国救民真理的曲折道路。孙中山伟大之处,并不在于一开始就如何正确,如何革命,而在于他能及时地从改良主义思潮影响下解脱出来,走上革命道路。

孙中山那篇洋洋洒洒、情文并茂的万言书,被李鸿章置之不理,束之高阁,这对孙中山这样一个满腔热情的爱国青年,不啻当头一瓢冷水。另一方面,甲午一战“我师败绩,割地赔款,创巨痛深”(梁启超语)。祖国的灾难,民族的屈辱,深深地刺痛了孙中山的心。国家民族的危机、个人上书的失败,终于使孙中山觉悟到:“知和平之法无可复施。……积渐而知和平之手段不得不稍易以强迫”。^①这种可贵的觉悟可以说是孙中山政治生涯中第一次重大转折。正如董必武同志所说:“孙中山在一八九四年的中日战争前后,开始他的革命活动。”^②

毛泽东同志把康有为和孙中山并列为近代中国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先进人物。但是他们得出的结论却迥然不同。正当中日战火正酣之际,康有为发动一千多名知识分子搞了一个“公车上书”,向光绪皇帝请愿。而孙中山却在海外组织了第一个革命的小团体——兴中会。兴中会的名称准确地表达了该会的宗旨:振兴中华。在中国近代史上最早提出这一宏伟目标者,盖始于此。兴中会最早树起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大旗:“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由于明确提出了

① 《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2页。

② 《新华半月刊》1955年第4号。

推翻封建王朝、建立共和国的主张，使兴中会成为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组织。

两年后，孙中山在英京伦敦被清使馆诱骗绑架，本来准备秘密押送回国处死。如果这一阴谋得逞，整个中国近代史的面目也许会大为改观。但是一个偶然机会竟使事情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一个仆役冒险帮助了危在旦夕的孙中山，将孙的处境通知了孙在西医书院的老师康德黎博士。康是英国人，在当地颇具声望。他向舆论界揭露了这一严重事件后，舆论哗然。在各方面的压力下，孙中山终被释放。

孙中山后来把这次大难不死的经历用英文写成《伦敦蒙难记》一书，立即轰动欧洲，风靡一时。从此，孙中山的名声骤起，成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公认的领袖，被尊为中国革命的“北辰”。中国革命的国际影响也随之扩大。清使馆的阴谋手段到头来弄巧成拙，适得其反。

在伦敦期间，孙中山认真考察了西方各国的社会政治情况。资本主义社会弊端丛生、危机四伏的现实，使他认识到“徒致国家富强，民权发达，如欧洲列强者，犹未能登斯民于极乐之乡也；……予欲为一劳永逸之计，乃采取民生主义，以与民族、民权问题，同时解决”^①。这便是“三民主义”学说的酝酿阶段。

一九〇五年，孙中山联合几个革命组织建立中国同盟会。宣布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宗旨，全部接受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为政纲。“三民主义”学说虽然有许多局限性，但在当时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正规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纲领。

^① 《孙中山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72页。

从建立兴中会开始，孙中山先后组织了十多次武装起义。这些起义震撼了清朝反动统治。但是，或因筹划不周、或因众寡不敌，结果相继失败。面对着一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孙中山毫不气馁，他以革命者大无畏的精神，百折不回。最初，他的信念是：“有以振起既死之人心，昭苏将尽之国魂，期有继我而起者成之耳。”直到同盟会成立时，形势大变，他更坚信：“革命大业可及身而成。”^①这种对革命事业必胜的坚定信念，乃是一个革命家所必备的品格。孙中山正是充分具备了这种可贵的品格，因而得到列宁的高度评价：“充满着崇高精神和英雄气概的革命的民主主义者”^②。

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国主义的走狗——清王朝反动统治，在中国大地上永远结束了延续二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创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并且在亿万人民意识中掀起了一个伟大的启蒙运动，因而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但是，迫于形势^③，匆匆回国就任首届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大总统的孙中山，没有多久就不得不把职位拱手让给帝国主义的新走狗——袁世凯。他错误地认为：当时主要任务不再是政治革命，而是经济建设。

袁世凯、段祺瑞、陈炯明……，一个又一个的新军阀混迹政坛，屡生战祸，中国人民仍然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现实无情地打破了孙中山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的幻想，也教育了孙中山本人，使他深刻地认识到：现在的中华民国，只有一块假招

① 《孙中山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76页。

② 《列宁全集》第18卷，第153页。

③ 当时的形势是：政治形势，列强一致拒不承认革命政权而属意于袁世凯，并不断对南京临时政府施加压力；经济形势，新政权财政极度匮乏，入不敷出，财源无着，告贷无门。“财政乃政权之命脉”，新政权势难久支。

牌，“实在是一个假民国”^①。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辛亥革命是失败了。孙中山因而陷入了苦闷之中。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紧接着爆发了“五四”运动，中国共产党诞生。数年之间，连续发生这么多重大事件，使处在艰难顿挫中的孙中山获得了力量，看到了希望，萌发了新的信念。

孙中山之所以伟大，不仅在于他领导了具有历史意义的辛亥革命，更在于他能紧跟时代前进的步伐，“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勇于面对新的革命潮流，总结经验教训，欣然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帮助，决定改组国民党，并将自己手订的三民主义加以丰富和发展，成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民族主义方面，增加了反对帝国主义民族压迫和国内各族人民一律平等的内容；民权主义方面，在民主共和国方案的基础上增加了“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的民主主义原则；民生主义方面，公开提出了“耕者有其田”的正确主张，并增加了“节制资本”的经济纲领。经过孙中山的丰富和发展，新三民主义具有反帝、反封建的时代特点和革命性质，和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纲领基本上相同，因而成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从旧三民主义到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是孙中山一生中最伟大的转变。事实表明，孙中山是一个永远站在时代前面指导斗争，不知疲倦地为改造中国、振兴中华而奋斗终生的革命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即使在他生命的最后一息，仍时刻不忘“革命尚未成功”，谆谆告诫后人“同志仍须努力”。

“和平、奋斗、救中国。”这就是一代伟人留给我们的最后一言。

^① 《孙中山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884页。

列宁曾经教导我们：“如果对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者不抱至深的敬意，就不能成为马克思主义者。”^①孙中山，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杰出的代表，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

由于孙中山毕生奔走，食不甘味，席不暇暖，因此没有足够的时间和条件来从容地提炼和熔铸自己的经济学理论武器。但是，散见于孙中山文稿中的经济思想却是非常丰富的，其中不乏颇有新意的见解。特别有价值的是，孙中山对社会主义的向往和追求。早在本世纪初，他就曾预言过：“二十世纪，社会主义将取代资本主义。”^②今天，光辉的现实，已经证实了他的预见。研究和总结孙中山这方面的思想遗产，无疑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也是对孙中山逝世六十周年的一种纪念。

研究孙中山的经济思想，首先值得称道的是，他对经济科学的命名，乃是中国经济思想史上的首创。经济一词，按照我国传统用法，是指经世济民、经邦济世的意思，是治国安邦的大计，并非指近代的经济科学。近代经济科学的英文是economy，最早翻译到我国的名词，叫“富国策”或“富国养民策”，后来有人译成“理财学”、“生计学”、“平准学”等等，歧义纷繁而不达要旨。孙中山认为：以上这些译名“皆不足以赅其义，惟经济二字，似稍近之”^③。从此，经济学一词才逐渐为国内学者所普遍使用。因此，可以说：孙中山是中国经济科学的命名者，或“经济学”一词的首创人，实不为过。

孙中山经济思想的核心部分乃是民生主义，而民生主义

① 《列宁全集》第21卷，第197页。

② 《人民日报》1962年11月12日第2版。

③ 《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510页。

的内涵,又因时而异。随着孙中山革命事业的发展,民生主义所包括的内容也不断扩展。早在辛亥革命以前,孙中山一直以土地纲领即平均地权为民生主义的唯一内容。辛亥革命后,开始有了解决资本问题的想法。建设事业提到日程上来以后,又增加了实业问题、教育问题。按照孙中山自己后来的提法,民生主义有四大纲,即土地、资本、实业、教育^①。本书便据此分章详论,最后总论民生主义。货币学说和人口思想则附在民生主义之后,略加评述。

^① 《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552页。

第二章 土地问题

众所周知，土地乃是人类栖息之所，衣食之源，是“人类劳动的一般对象”^①。孙中山也认为：土地是“人生最要之事”^②。因此，土地问题被列为民生主义的第一项内容。

土地制度问题又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所面临的一个根本性课题。因为封建地主阶级土地所有制是整个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只有消灭这种土地所有制，才能解除封建主义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束缚，为资本主义经济自由而迅速地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也只有消灭这种土地所有制，才能把农民群众从封建主义专制制度的压迫下解放出来，投身到资产阶级革命的滚滚洪流中，保证革命顺利地进行到底。因此，马列主义经典作家一贯重视农民群众在资产阶级革命中的决定作用。恩格斯在总结德、英、法三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经验时，曾经指出：欧洲三次重大的资产阶级革命，如果没有农民参加斗争，“单单资产阶级决不会把斗争进行到底，也决不会把查理一世送上断头台”^③。

在中国，土地制度对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有着更为重大、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03页。

② 《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552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92页。

更为紧迫的意义。因为旧中国是一个受几千年封建专制制度长期禁锢的落后的农业国，又是一个受许多帝国主义列强共同奴役和剥削的半殖民地国家。农业是国民经济的主体，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只有消灭封建主义，解决土地问题，才能解放生产力，为资本主义在中国顺利发展开拓道路；才能把广大农民的革命积极性调动起来，唤起千千万万贫苦农民，组成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冲决一切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结成的反动防线，实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历史任务。

面对着如此重大而严肃的课题，十九、二十世纪之交，许多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提出过各色各样的答案。但是形成系统理论并在当时思想界发生过重大影响的，只有孙中山的平均地权学说。

孙中山的祖先历代务农，祖、父两辈都是没有寸土的佃耕农民。他本人自幼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因此，早在青年时代就非常关心农业生产。这可以从他早期作品中找到有力的说明。当他还是一个医学院的学生时，就写过一篇专门论述农业生产的文章，题目叫《农功》，发表在郑观应主编的《盛世危言》第三卷上。文章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见解，如：“务欲各尽地利，各极人工”、“务使野无旷土，农不失时”等等。最后他总结说：“以农为经，以商为纬，本末备具，巨细毕赅，是即强兵富国之先声、治国平天下之枢纽也。”^① 恩格斯曾经说过：“农业是整个古代世界的决定性的生产部门”^②。马克思也认为：农业乃是“直接生产者的生存和一切生产的首要的条件”^③。尤

① 《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45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715页。